



林强 著

空间诗学与文学批评： 两岸文学专题研究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空间诗学与文学批评：
两岸文学专题研究

林强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诗学与文学批评:两岸文学专题研究/林强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550-0653-4

I. ①空…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7775 号

空间诗学与文学批评

——两岸文学专题研究

林 强 著

责任编辑 莫 茜

助理编辑 刘徐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2

厂 址 福州市鼓楼区福飞路义井村池前 10 号鼓东工业小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653-4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母亲何少英女士（1957 — 2014）

父亲林振文先生（1953 —）

目 录

第一辑 《丑陋的中国人》在祖国大陆与香港的接受研究

- 《丑陋的中国人》在 1987 年的批评风波与相关报刊史实 (3)
-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与
《丑陋的中国人》在祖国大陆的接受研究 (12)
- 偏见与误读：学术批评中的《丑陋的中国人》 (27)

第二辑 文学传统的隐线：作家旅行、文学地志与历史叙述

- 换一副笔墨写东北：孙陵《大风雪》解读 (43)
- 底层视角，家国叙述 (50)
- 试论简嫔散文集《天涯海角——福尔摩沙抒情志》的历史叙述
- 台北的焦虑：简嫔散文的都市书写 (58)
- 坐在想象与现实的交界 (68)
- 读钟怡雯散文精选集《惊情》

第三辑 文学机构与刊物研究

- 台湾文学研究所课程分析与批评 (79)
- 以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为例

空间诗学与文学批评：两岸文学专题研究

2

读者批评空间与现代派文学	(94)
——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读者研究	

第四辑 空间诗学

台湾当代散文中的超现实时空形式及其意义结构研究	(109)
台湾后现代散文差异空间美学研究	(119)
对读记：林耀德与大陆新生代散文家的都市意识和空间想象	(130)
当代台湾散文家都市空间理论引介	(144)

第五辑 周作人研究

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的困境	(157)
——20 世纪 30 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研究之一	
周作人个人主义视域下的“人情物理”观	(167)
——20 世纪 30 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研究之二	
周作人对《论语》的个人主义阐释	(175)
——20 世纪 30 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研究之三	

后记	(186)
----------	-------

第一辑 《丑陋的中国人》
在祖国大陆与香港的接受研究



《丑陋的中国人》在 1987 年的批评风波与相关报刊史实

一、批评风潮的酝酿

1986 年 12 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一出版即被抢购一空。但好景不长，很快《丑陋的中国人》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牧惠在《丑陋的风波》一文中忆及：“时是 1986 年 12 月中旬，外地已有大学生游行，但是在座的人（指《文汇报》在京召集的一个杂文家座谈会——笔者注）全都没有料到游行会游出一个惊人的后果，更没想到还与《丑陋的中国人》的命运有什么联系。……1987 年 1 月 16 日晚总书记辞职的消息播出后，《丑陋的中国人》马上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①

随后，针对《丑陋的中国人》，不少报刊发表争鸣文章，或褒或贬，几近酿成风波。牧惠等人将正反两面文章编成《〈丑陋的中国人〉风波》交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于 1989 年出版。此书又以《都是丑陋中国人惹的祸》在台北出版。

时过境迁，如今多家出版社不仅竞相出版柏杨作品，当年翻印《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辑也纷纷撰文述其“盗火”历程，如牧惠的《丑陋的风波》^②、弘征的《在大陆首家出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琐忆》^③和陈俊年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前后》^④等。然而，笔者也注意到，当事人的回忆多局限于与《丑陋的中国人》相关的编辑、出版与自身受批判的经历，而对该书之所以受批判、遭禁随即又被解禁的原因多语焉不详，且为读者留下不少困惑。为此，笔者翻阅了当年发表批评文章的几家报刊，结合新近发表的史料，力图还原整个批评风波，分析其意识形态因素及相关报刊构成的舆论环境。

① 牧惠：《漏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2 页。

② 该文收入《漏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该文载于《芙蓉》2010 年 4 期。

④ 该文载于《花城》2010 年第 2 期。

二、舆论、出版与批评过程

《〈丑陋的中国人〉风波》一书搜集到的第一篇批评文章是《龙与虫》，发表于《天津日报》1986年12月15日。此文当是作者看到国内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发表的批评文章。文章持论较为公正，既点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的偏颇，亦论证了鲁迅在批判国民劣根性之时也“论”出了民族自信心这一观点。此后是李宗凌的《对〈丑陋的人〉的几点看法》^①。该文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它指责柏杨因其政治倾向性和政治偏见而做出失实判断。文章批驳柏杨所谓“文化大革命”是“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遇到过的这么大的一个浩劫”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作者做了一个拙劣的比较，即（“就其对人类和民族的损害而言，‘文化大革命’既不能与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对中国人民进行的野蛮屠杀相比，更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希特勒对全人类进行的杀戮相比。”^②）继而是汪剑的《民族虚无主义要不得》，该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月27日。文章指责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③，并认为随着柏杨这些观点的传播，“使得不少缺乏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的青年，产生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情绪”^④。更严重的是，汪剑警告说：“对中国人的否定，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常常伴随着一种危险的思潮，这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死灰复燃。中国的人不行，中国的文化不行，中国的制度不行，怎么办呢？似乎只有从里到外‘全盘西化’才是‘济世良方’。而所谓‘全盘西化’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迎合了极个别的人搞资本主义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是危险的。”^⑤

① 该文载于《理论信息报》1987年1月26日，收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编辑部编《〈丑陋的中国人〉风波》，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②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编辑部编：《〈丑陋的中国人〉风波》，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页。

③ 同上，第14页。

④ 同上，第15页。

⑤ 同上，第15～16页。

从指认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引出“全盘西化”，再进一步点明“全盘西化”即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要害，最后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顺利会师，汪剑的文章显然是顺应政治变局和意识形态调控的应题之作。无怪乎，台北的《中央日报》曾直截指出：“《丑陋的中国人》被批，主要是中共不能忍受他的‘全盘西化’观点，认为大陆青年‘崇洋’受他的影响（柏杨自认崇洋但不媚外）。 ”^① 牧惠也指出，汪剑此文是“消毒”文章，即它是对《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曾于1986年12月19日发表推荐文——《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实际上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的改名文章）的消毒。

1987年3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社论就中国科学家取得超导研究重大突破一事发表评论：“中国人是有志气、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曾使我们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实际上，社论不点名批评了柏杨有关中国人劣根性的观点。该报还于第三版删节转载香港学者孙国栋的文章《中国人丑陋吗？——就教于柏杨先生》（原文刊载于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号，原题为《就教于柏杨先生——评〈丑陋的中国人〉》；先由《博览群书》杂志1987年第2期转载）。牧惠曾观察到，在《光明日报》转载事件之前，“该报的广告栏和《博览群书》第一期卷首的下期要目预告显示该刊第二期将以头条位置刊出一篇评《丑陋的中国人》的重要文章。几天后，从该报《文摘报》中缝广告获悉，这篇重要文章的题目有了变动。从而使人明显看出一场批判柏杨和《编后记》的事情正在被一些人作为一件大事忙碌地进行的印象。何以最后仅仅转载此文，其中有什么内幕，一直无法知悉”^②。

对此，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王伟在近期发表的《邓小平与“5·13讲话”》稍可解读者困惑。王伟写道：1987年年初，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进驻中办厂桥招待所二层（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驻三层）。“‘写作班子’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印成的材

① 《柏杨挨批》，刊于《中央日报》1987年5月13日。

② 牧惠：《漏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

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赵（指赵紫阳——笔者注）在书记处会上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①

由此亦可见，时任《红旗》杂志文教部主任的牧惠，其政治嗅觉是敏锐的。当事人之一的弘征也在《在大陆首家出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琐忆》一文中予以佐证：“不料到了1987年初耀邦同志刚辞去总书记职务，批评的声浪便立即滚滚而来，有一家刊物等不及组织批判文章，且将香港一家月刊的境外人批评台北版之文加以转载，然后又由一家大报刊登，只是将明显‘不宜’之处作了一些删节。”^②

据王伟所述，“写作组”并未因赵紫阳而停止活动。“4月6日到12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评》三家报刊在河北涿州开了一个‘组稿会’。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③然而，经赵紫阳调阅后，此事由谁处理、如何处理，王伟没有查到资料。“但据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④

从后来批判《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章发表情况来看，当时中宣部的相关刊物已经点起批判的苗头，而其他几大报刊也呈配合与应和之势。

比如，前面提到的《博览群书》是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徐力以^⑤于1984年初倡议、由光明日报主办的一份书评刊物。该月刊于1985年1月正式刊出。除了在1987年第2期转载孙国栋评论文章外，该刊亦在本期卷首语《反省与沉思》中对柏杨和孙国栋的观点进行简要评点。同期，“学林百家”

① 王伟：《邓小平与“5·13讲话”》，《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

② 弘征：《在大陆首家出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琐忆》，《芙蓉》2010年4期。

③ 王伟：《邓小平与“5·13讲话”》，《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

④ 同上。

⑤ 许力以从1982年至1987年1月一直担任出版局局长。参见袁亮《我认识的许力以同志——一位新中国出版业创建者的历史贡献（上）》，《出版史料》2008年第4期。

栏刊载秋禾的《永恒的巨流——评台版〈中国文化新论丛书〉》。文章在篇首引用《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弁言》云：“《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要帮助我们拨开云雾，重现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恢复我们与固有文化亲切而自然的关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涵泳在这个永恒的活水泉源里。”文章评论道，该丛书第一二卷“高屋建瓴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胸怀’，并重点地致力于纠正近百年来海岛人民对中国文化存在的片面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第2期的“下期要目”曾醒目预告《读〈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定劫数——读〈儒家文化的困境〉》，但二文均未在下期及以后各期中刊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定劫数》一文标题曾在第3期封面上印出，但目录与内页均未见此文。想是编辑操作失误，或因临时抽出文章而未及改动封面就仓促出版。由此，我们稍亦可窥测舆论风向与刊物选、刊稿件的微妙关系。该刊第4期卷首语《让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批评指向更为鲜明而尖锐。文章评论道：有些人在“走向世界”这一题目中宣传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只有彻底否定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乃至上层建筑”；“在比较发达民族与不发达民族时，只热衷于西方个体发展观念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只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弱点，却避而不谈唯一保持到如今的世界最古老的中华文明中蕴涵的生命力”；在把柏杨与鲁迅相提并论时，“有意无意忽略了鲁迅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时仍把希望寄托于民族本身，而非如某些专著那样，几百页的篇幅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个民族的无前途与无希望”。文章最后得出近乎公允的看法：“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自诩为世界潮流中的现代派勇士，对本民族的一切冷嘲热讽，而是花费一些精力去弄清中外民族文化各自的丰富内涵及异同，这样才能清醒地立足于本民族之基础，有效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促进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乃是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①本期还特别刊发《受欢迎的〈诸神的起源〉》、罗素的《中西文明比较》、熊达云的《对信息的敏感症》以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文，以配合本期主旨。

又如《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也是由许力以提议，由中宣部出版局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书评刊物。该刊于1987年1月15日正式出刊，原是季刊，由许力以^②担任主编，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伍杰（后任局长）、副局长袁

① 《卷首语·让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载《博览群书》第4期。

② 从1987年到1994年，许力以一直担任该刊主编。后改任顾问。参见袁亮《我认识的许力以同志——一位新中国出版业创建者的历史贡献（下）》，《出版史料》2009年第2期。

亮、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边春光、副署长宋木文、副署长刘杲等担任编委。

1987年第2期《中国图书评论》(1987年4月15日出版)上发表了梁超然的《鲁迅柏杨异同论——评〈丑陋的中国人〉》和隋缘的《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对湘版〈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的几点想法》。《中国图书评论》于1987年第2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促进出版事业健康发展》以及主编许力以《出版自由和社会主义文明》等文，并在同期与光明日报联合开展“全国图书评论征文评奖活动”。梁超然的文章即在本期征文栏发表，隋缘的文章在本期“随想与漫议”栏发表。

综观此次批评风波，恐怕只有香港的孙国栋和大陆的梁超然二人的文章较具学术含量。^①也许正因为此，梁超然的《鲁迅柏杨异同论》紧接着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3期(1987年5月出版，双月刊)刊载。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于1986年9月创刊，是经文化部党组批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一份文艺理论类刊物。该刊从筹办伊始就得到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重视与支持。邓力群参加了1986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建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汇报会”。他指出：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文艺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地研究文艺的历史发展，分析当前国内外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总结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②在整个批评风波中，《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在较短时间里连续刊发几篇批评与反批评文章，呈现出较为激烈的学术争鸣态势。1988年第1期，该刊登出严秀、牧惠和弘征的反批评文章《护短与爱国——评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若干批评》。同时刊发编者按曰：批评与反批评如都能顺畅发表，真理自然愈辩愈明，“有鉴于此，本刊非常乐意为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提供园地”；“双方的争议不仅在于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评价，也涉及诸如怎样看待中国人的‘国民性’、怎样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怎样看待西方精神文明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颇为密切的问题。当然，也涉及批评和反批评的态度、方法、文风等问题。毫无疑问，就这些问题深入进行探讨，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健全批评和反批评的风气。”^③同年第2

① 实际上，香港孙国栋有一系列的批评文章，后结集为《评柏杨》一书（香港：明报出版社1989年版）。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② 邓力群：《邓力群同志的讲话》，《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2期。

③ 《编者按》，《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1期。

期，该刊登出梁超然的再批评《再论鲁迅与柏杨——兼答〈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第5期则刊发了李友滨、王凤海的《也谈护短与爱国——与〈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再商榷》。

这几篇文章主要的分歧点在于：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评判。梁超然、华夏志（即李友滨）等人认为，柏杨及其《丑陋的中国人》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同样强调“中国的脊梁”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而柏杨在批判中国人的丑陋时则以偏概全、夸大了中华民族的缺点甚至污蔑全体，以至于令人产生民族虚无主义情绪。严秀、牧惠等人则指出，批评者未能把握住《丑陋的中国人》的总体思想，未能看到柏杨重视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二、“药方”问题。批评者认为，柏杨要中华民族“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即学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社会风习等；这种“崇洋媚外”的态度，是“一贴毒剂”，将贻害民族。反驳者则引用柏杨原话，强调柏杨貌似过激的“崇洋”论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理性判断基础之上；至于被柏杨过分肯定的“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等民主政治制度，论者更是大胆指出它们是“欧美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经过两三个世纪的不懈斗争获得的有限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至少比毫无民主法制可言的状况要强一些”^①。三、批评文风问题。李友滨等人指责柏杨散播“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理论”。严秀、牧惠等则认为，李友滨等人对柏杨的偏激言论进行简单的曲解与上纲上线，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不无“文革”大批判的架势。对此，李友滨再度撰文进行反驳，并指出争鸣双方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1. 争鸣的目的：追求真理；2. 争鸣双方要摆事实、讲道理，造成团结和谐的气氛；3. 平等讨论、尊重对方。^②

《风波》一书收录的其他批判文章亦可见全国其他报刊正在酝酿的批判之势。如《学习与实践》杂志1987年第4期刊发的两篇文章——爱华的《丑陋的〈丑陋的中国人〉》和张宿宗的《一面哈哈镜》；《作品与争鸣》1987年第6期刊发的左达的《中国人与中国文》等；《红旗》（内部文稿）1987年第11期发表的华夏志、王凤海在《一本有严重片面的书——评〈丑陋的中国人〉》

^① 严秀、牧惠、弘征：《护短与爱国——评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若干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1期。

^② 李友滨、王凤海：《也谈护短与爱国——与〈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再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5期。

兼与“编后记”作者商榷》，该文又刊于同年第5期的《河北学刊》，署名李友滨、王凤海等。爱华的文章指责柏杨“既崇洋又媚外”，《丑陋的中国人》意在“全盘否定中华民族”；张宿宗认为，《丑陋的中国人》只集中华民族之丑，其效能是“宣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之气，增补民族悲观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之气”。左达评断：《丑陋的中国人》“肤浅、武断和缺乏常识”，比之更等而下之的还有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从上述文章的发表情况来看，1987年4月是批判文章较为集中的刊发时间，刊发批判文章的刊物也相对固定，这都与王伟所述“大批判组”的短暂运作时间和筹备“大批判组”的主要单位有着微妙的关系。

三、风波暂息的原因

细察这次风波的具体过程，当时的中央领导起到关键作用。原先，1985年8月，朱厚泽接替邓力群担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则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朱厚泽回忆，胡耀邦曾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我”指朱厚泽，笔者注），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①朱厚泽上任后，试图以“宽松、宽容、宽厚”思想在政治“夹缝”中打开意识形态局面。但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②从1986年10月下旬开始到是年12月，全国性学潮愈演愈烈。邓小平最终于该年12月30日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谈话称：学生闹事“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③。邓小平甚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④随后是胡耀邦辞职事件；接着，朱厚泽也于1987年1月28日被正式免去中宣部部长职务。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当天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① 杨继绳：《追忆朱厚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② 杨继绳：《追忆朱厚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做出政策上的规定。《通知》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这场斗争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有关党组织要及时向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通报情况，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建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对学术和艺术上的不同意见，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用正常讨论、批评和反批评的办法解决，以求正确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片等，一概不进行清理；其中确有严重政治错误和严重社会伦理错误、社会效果很坏的，应由中央主管部门妥善处理。”“报刊登载批评文章要讲究质量，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空洞重复，切忌沿用‘文革’和过去运动中的不恰当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发表。”^①由此可见，为了防止改革开放进程夭折，赵紫阳及时为“反自由化”划定了框框，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虽然，在主管意识形态个别领导的纵容下，当时的中宣部曾试图突破这个框框，通过各种方式想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但都被赵紫阳及时制止。这也是《丑陋的中国人》虽然受到一时的查禁和批判，但很快又被解禁的主要原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93、194页。